

# 时代洪流培育我坚强奋进 ——马咏南细述七十多年风雨历程 (二)



马咏南 (左) 在中国访问时与云南彝族美女在一起。

我们必须树立“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努力学习”的学习目的，准备把自己的智慧献给为创造人类美好的、幸福的社会斗争中去。这样，对学习我们才有高度的责任感，才会珍惜时间。

我还勇敢的表白读印尼文系是为维护和发展印尼民族的文化，清除美帝国主义的文化。那时世界革命正于雷霆万钧之势降临到印尼，美帝国主义与一小撮印尼的反革命份子正在千方百计阻挡革命的洪流。他们不仅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大举进入，也在文化上进行渗透，用靡靡之音的歌，黄色的电影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谬论，使印尼人民崇拜美帝国主义的“文明”，甘愿接受美帝的思想统治。

因此，维护印尼民族原有特性的文化，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使命。中华民族

和印尼民族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有着优秀的语言和文化遗产。我们身居印尼，除了学好中文，也得学好印尼文。将来我回中国深造将投入广播事业，掌握好中文和印尼文以促进中印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巩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我在共和大学新生入学服务锻炼周时，思想激进，高唱革命之歌，同学们笑我好像“北京电台”。当时，校方也坚决反对虐待新大学生的“拖屍”制度，“拖屍”制度 (Pelonco) 是荷兰殖民统治的残余文化，即由学长们故意虐待和侮辱新生，逼新生学狗叫，学猫爬，故意乱剪女生的头发，或从头到脚淋鱼肝油，腥臭难闻无法坐公交车回家，甚至把不会游泳的新生推进游泳池，差点出人命案。

这种训导新生的制度是不符合印尼民族的文化，大学生应该成为革命青年，要

用苏加诺的“政治宣言”来训导思想，不应用“拖屍制度”来培养其奴隶性；大学生应该有爱心，敬老爱幼，尊师重道，珍惜生命。

共和大学首先反对和取消“拖屍”制度，号召大学生们“先做政宣者，后做科学家”，先红后专；大学生是人民之子，应该要下乡看农民，是多么辛苦种田，劳动是最光荣，应该进行有利于人民的工作；大学生要着重民族建设和品性。

在充满革命激情的校园里，政治挂帅，使我对印尼的政治发展充满好奇和探索，限于当时我是中国籍，校方在肖玉灿先生的严格命令下，不是印尼籍的大学生只可以上政治课，但不可以参加政治活动，如参加左派大学生团体。

我当时是中国籍，所以只能参加校园的文艺活动，体育运动，社交活动。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质，共和大学的所有文科的本科生，第一年必修政治课。很多同学都嫌它枯燥乏味，加上我们从华校毕业，印尼文程度低，为了克服自己的印尼文“先天不足”，我开始多看印尼文报，听印尼语电台，更幸运的是讲师为了提高我们印尼文学系学员对印尼文学的认识和兴趣，介绍我加

入“暴风雨话剧团”，团长是峇厘人，其他负责人有马达人，爪哇人，马都拉人，巽达人，他们非常优秀，有诗人，小说家，画家，演员，非常欢迎共和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入团。

经过筛选后，只有我和同乡的女生许同学留下。1965年九卅事变后，印共被套上莫须有叛国之罪，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连共和大学也遭城头失火，池鱼之殃，大学被右派大学生和军人焚烧，许多教授，讲师和大学生，尤其是参加过印共45周年党庆文艺表演的学生，未经审判就锒铛入狱，其罪名是印共同情者。于是许多同学纷纷回国，恰碰上中国文化大革命，不单没书读，反而被分配到北大，天寒地冻，使爱国热情也冷冻了，1971年只好申请出国回侨居地，但多数滞留在香港，回不了故乡，如我哥和两个姐姐，他们有心报国恩，祖国

永铭于心，是祖国培养许多印尼归侨大学毕业生成才，似我大哥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来香港能在香港电力公司任高职，大姐通过港英联邦医生考试获准字在港中医院行医，1973年，他们是万不得已离开栽培自己的祖国，担心下一代背负华侨有海外关系的原罪，不能考上大学，只好申请出国回侨居地。

1966年初，我得知和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回国后因为收到姑姑从香港寄来的信和礼物，被造反派指控“里通外国”，没完没了的批斗，一时想不开而跳楼自尽。此惨事令我三思，抗拒父亲逼我回国深造。父亲骂我不爱国，恐吓我要脱离父女关系。父亲是典型的老华侨，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但是文革的惨剧，连侨联主席廖承志都遭批斗，更何况我们这些小人，文革回国是等于飞蛾扑火。



马咏南父亲80岁，90岁与母亲合影